

自今年中美貿易戰上演以來，評論的焦點逐漸由貿易糾紛，轉變至兩國全方位的競逐較量。在明年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之際，迎來的不是中美元首高規格的友好互訪，倒是兩國發言人在不同場合的短兵相接。值得關注的是，在新冷戰的背景下，「中國模式」將面對怎樣的挑戰？敝刊2月號會有專文深入探討，敬請留意。

——編者

台灣民主化

張玉法的〈從革命民主到民主革命——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與轉變〉（《二十一世紀》2018年10月號）一文雖短，卻涉及民主化的許多重要話題，信息量很大，因而也必然會引起爭議。

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是一個多因推動的漫長歷史過程。在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提出了民主的理想目標：建立一個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顯然，國民黨儘管受到蘇俄列寧主義政黨的影響，但其主要模仿對象還是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民主。縣鄉選舉的存在，對地方自治和公民訓練起到了重要作用。

國民黨遷台以後，國家的治理能力也有極大提高，隨之出現的就是二戰後台灣的經濟奇迹，為未來民主化奠定經濟基礎。言論自由的空間逐步出現和擴大，報禁和黨禁最終被解除。黨外勢力雲集，使得反對黨政治出現。儘管國際環境的風雲變幻如作者所言，對台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灣可能是負面因素，但從民主化的角度看，卻未必不是積極的外因。與美國斷交和被聯合國驅逐後，國民黨政府轉向挖掘內生的民主制度資源，以重新鞏固政權的合法性。

比較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的經歷，可以說一系列民主化的動因在台灣形成了良性的秩序和循環，其中最重要的是精英選擇。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時說過：經濟社會發展使民主化成為可能，而政治精英(包括反對黨精英)使之變為現實。而後民主的鞏固又得益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公民素質的提升。公民權利意識是一方面，而公民美德(中庸合作精神，捍衛民主自由並願為之現身、參與等等)是另一方面。上述台灣政治發展的多項經驗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過程都有啟發。

在觀察台灣民主運行和實踐時，作者指出了幾個潛在的威脅，例如台海兩岸的分立使得問題更為複雜化。在羅斯托(Dankwart Rustow)看來，國家統一動態民主化啟動的唯一前提。作為一個還未宣布獨立的島嶼，台灣的獨特性沒有普遍意義。但台灣確實需要解決統一問題：要麼和大陸在民

主的框架下追求最終統一，要麼和大陸完全切割而獨立建國。如果說台灣的獨立阻礙部分來自大陸的立場，那麼更重要的是台灣島內還未形成獨立的共識。與此相關，這裏涉及作者提到的相對多數、絕對多數，筆者還要加上一個超級多數(例如75%甚至以上)，從英國脫歐陷入的困境可以看到簡單多數帶來的問題。如果在台海統一問題上，國民黨和民進黨水火不容，就會繼續撕裂台灣族群和社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化，危害民主制度所需的較為同質的公民政治文化。

對於作者提出的「革命民主」和「民主革命」的對比，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革命民主」似乎有替國民黨早期的訓政和軍政遮醜之嫌。以後來的「民主革命」使前面的「革命民主」合法化，似乎有點功利。再說，當今中國共產黨也提出「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其實都是詞語的自我矛盾。專制和民主有質的區別。如果我們把一個概念不斷拉扯成「變形金剛」，很可能我們就踏上了危險的斜坡，不知前面是否有深淵。

夏明 紐約
2018.11.9

新問題意識下的歷史書寫

歷史書寫一直是史學界較為關注的話題，其書寫又離不開敘事的建構。在不同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主敘事，這些不同的主敘事背後又有不同時代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轉變是主敘事變化的重要前提和動因。李懷印的〈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書寫——再議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及分期問題〉（《二十一世紀》2018年10月號）一文，對中國近現代史主敘事及分期的新思考便是基於問題意識的變化而引發的。

問題意識貫穿全文，成為該文敘述的一大特色。作者首先回顧了二十世紀中國近現代史三類主流敘事，並指出其中的問題意識是為了回應黨政、民族、國家所面臨的現實挑戰。其次指出如今問題意識的變化，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面臨新的問題：現實的中國究竟是甚麼樣的國家？其產生是否符合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常規？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它與西方國家近代建國的路徑相同嗎？由此回溯中國近現代史，從而提出全新的觀點。再者，具體從國家的視角申論了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和分期，就人口和疆域而言，最關鍵的發展是在清代前期，就主權而言發生在晚清時期，就政權而言重大的突破是在民國時期。作者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是從十七世紀以來由原來的華夏皇朝，經過近代的多族群疆域國家轉向，成為集中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個大轉型在1950年代落腳。二十世紀「既大且強」的中國國家轉型與西方的嬗變過程有着不同

的動力和邏輯。最後，作者對二十一世紀中國國家轉型可能面臨的新問題進行了展望，如中國地緣戰略的重新界定、疆域整合中的兩岸關係的處理、中華民族的認同問題，並指出以全球化和區域化為基礎的人類共同體的全新時代將會取代具有特定內涵的中國近現代史。

歷史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往往基於新的問題意識。而且新的問題意識要足夠「新」，才能真正提出有價值的學術議題。目前國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與過去相比，已經有着很大的變化：研究內容愈來愈細緻，研究領域也愈來愈廣泛，但同時也要看到「量」的增加似乎沒有帶來「質」的提高。研究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宏大架構把握不夠，使得研究往往是具體成果的堆砌，這就是所謂的「碎片化」。對於如何克服「碎片化」，達到「以碎立通」的境界，筆者認為問題意識的轉變最為重要——不僅僅要由「舊」到「新」，更要從「小」到「大」。因而，筆者認為該文給讀者、研究者最大的啟示在於以既「大」又「新」的問題意識，來更新歷史的書寫。

王琛 廣州

2018.10.15

香港與中共革命關係

賀碧霄的〈情報、人員和物資的樞紐：1930至1940年代香港與中國共產革命〉（《二十一世紀》2018年10月號）一文，在運用多國檔案的基礎上，對在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過程中共產黨及相關人士在香港的安

排與行動進行了敘述。該文偏重梳理史實，分析與解釋大多集中在各部分末段與全文結語部分。就此筆者提出兩點疑惑：

在對研究意義的論述中，作者將本文主題「香港與中共革命關係」視作香港歷史研究與中共革命研究的一個結合點，並提出三重研究意義：一、對中共革命在城市中如何發揮作用；二、對中共革命勝利如何受到跨國流動網絡影響；三、對冷戰史研究。這一思路相對新穎，也承接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但在本文中，後兩點並沒有充分體現，冷戰史甚至基本沒有涉及。

此外，作者還提出香港作為英國唯一未發生民族革命和地方自治運動的海外殖民地的特殊性，認為可以將中共地下革命看作是一種替代性政治運動。這一思考雖然開拓了香港歷史研究的思路，但也使文章的一個瑕疵凸顯出來。作者所引用的史實多數是黨組織政策、結構變遷與人員調動，基本沒有反映出外界變化如何影響到香港民眾，行動的主體仍是中共。作者在回應「在相對開放的城市環境中，中共革命理念與組織傳播為何依然能收效」的問題上，仍是以抗戰爆發後香港共產黨組織人員的變化作為落點的，香港民眾的反應仍然缺席。這就意味着該文討論的中共「城市」共產革命中，似乎僅有「精英」被納入統戰範疇，而城市居民並不在場。

嚴飛 北京

2018.10.30